

研究論文

在中界之處打造性自我： 論雙性戀認同與情慾實踐

陳素秋

陳素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通訊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Email: susuchen@ntnu.edu.tw。由衷感謝審查者提供的修正建議，強化了本文嘗試對話的理論脈絡，使得文章所欲提出之論點得以更為清晰。也謝謝高詩雯同學在研究過程中所提供的多項高效率之協助。

收稿日期：2014/08/01，接受刊登：2015/02/09。

中文摘要

雙性情慾理論指出，雙性戀雖得以被看見，但卻總被放置在中界之處的處境中。本文嘗試探究在臺灣社會脈絡下，自我認同為雙性戀者，如何在此中界境況中，回應異／同邏輯與其他情慾論述，以建立起自己的性認同並實踐其雙性情慾。

本文主張：（1）在臺灣同志運動下所形成的同性戀次文化群體成為雙性戀性認同建構的重要參照群體，而現代性的自我反身性大業，也成為驅動雙性戀持續探索自我認同的核心動力；（2）雙性戀與同性戀之間既競爭也合作的關係，使得具雙重意涵的「同志」對雙性戀來說成為性身分地景中的重要選項，也使得酷兒成為較不可欲的身分標籤；（3）雙性戀者雖強調在情慾偏好上可向兩個性別開放，或是不重視性別，但性別仍透過設定互動中的做性別模式以及身體象徵意義的性別化，因而框架或甚至限制雙性戀的情慾活動。

關鍵詞：雙性情慾、性認同、藩籬知識論、異同邏輯

**Crafting a Sexual Self in the Middle Ground:
On Bisexual Identity and Bisexuality**

Su-Chiu CHEN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Bisexual theorists point out that bisexuality occupies the position of a “middle grou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is so-called “middle ground” in Taiwan and explores how self-identified Taiwanese bisexuals forge their sexual identity and perform bisexuality.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1) gay and lesbian subcultural groups function as a significant referenti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isexual identity, driven by Giddens’ so-called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 in modernity; (2)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bisexuals and homosexuals in the LGBT movement in Taiwan makes the term “Tongzhi” of double meaning, becoming a more desirable identity but forging “queer” as a less desirable label; and (3) although the bisexuals interviewed for this research emphasize they are sexually attracted to either gender or neglect gender, gender still frames their bisexuality by setting up patterns of performing gender in interactions and impinging upon certain meanings of the body.

Keywords: Bisexuality, Sexual Identity, Epistemology of Fence, Hetero/

Homo Logic

一、雙性戀的「現身」與之後

情慾政治運動的開展使得多元性身分有機會在社會生活場域中再現，在這樣的聲浪中，現今雙性戀似乎不再被視為罕見之詞。以美國為例，從1970年代僅在舊金山等大城市有著地方性組織，至1980年代末期，各地雙性戀群體開始聚集發展出全國性行動，因而促使雙性戀此性身分逐漸普遍被採用。¹到了1993年的華盛頓同志大遊行時，更首度將「雙性戀」納入遊行名稱中（Tucker 1995）。

然而，儘管雙性戀此性身分逐漸浮現，但雙性情慾的相關研究在英語世界並未因此蓬勃發展。不僅學者回顧英語世界的雙性戀論述時，指出雙性情慾研究明顯偏少（Angelides 2001; Hemmings 2002）；在Esterberg（1997）針對美國雙性戀社群所進行的訪談中，受訪者更清楚表達被忽略的感受：他們感嘆，雙性戀社群的成員人數總是不多，在同性戀平權運動後，人們似乎立即轉而關注跨性別議題，雙性戀就這麼被跳過去了！

在臺灣，雙性戀一詞，也在過去十年裡逐漸出現在公共論述中。2003年的臺北市同志公民運動，決定將「同志」的概念由同性戀擴展為包含雙性戀與跨性別，於是該運動的英文名稱正式改為LGBT公民運動（LGBT Civil Rights Movement）；同一年，由臺北市政府出版的《認識同志手冊》，也首次增加對雙性戀與跨性別的討論。此或許為雙性戀一詞首次出現在國內官方組織的傳播文件中。之後該手冊的歷年出版，也

¹ 1990年代前，雙性戀（bisexual）此一性身分，在美國其實鮮少被明顯提及，例如，1970、80年代時，通常稱呼同時與男性及女性有著情慾互動的人們為性放任者（swinger），或是自由愛的提倡者（free-love advocator），而較少使用雙性戀一詞（Udis-Kessler 1995）。

仍延續納入雙與跨的介紹。而2008年由教育部所出版的《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裡，對於同志一概念的討論也同樣包含了對雙性戀的介紹。「雙性戀」應被包含於對性少數群體的介紹，幾乎成爲一種定調。

不過，若論及「雙性戀」此語彙得以做公開論述資源，更早在2001年ptt所成立的bi版，² 亦具相當影響力。本研究中的多位受訪者皆曾提及，曾透過逛bi版來探索自己的雙性戀認同。這意味著，自2001起，雙性戀在網路中便已成爲性身分的選項之一。

在被納入性少數的論述後，雙性戀稍後更透過雙性戀運動在臺灣發聲。2007年臺灣第一個雙性戀團體「Bi the Way·拜坊」成立（以下簡稱拜坊），該組織成立了網路社群，並在北中南東各地不定期的持續舉辦活動，強調爲雙性戀發聲。³ 拜坊成立後至本文寫作的2014年爲止，每年固定參加臺北同志大遊行，也曾多次在遊行步行結束後的終點站舞台活動中，代表雙性戀族群上台發言。

儘管雙性戀得以在臺灣的公共論述中現身，但國內關於雙性戀的相關研究仍明顯偏少。第一篇雙性戀論文應爲徐佐銘於1999年所發表之文章，該文指出雙性戀認同包含意指既愛男生、也愛女生，以及情慾實踐無關乎性別的兩種不同方式。此文以點出雙性戀內涵之歧異性，開啓國內雙性戀研究，但可惜後續討論十分有限。2002年後，陸續出現少數以雙性戀爲主題的碩士論文，主題包括雙性戀出櫃難題、情感關係以及社群參與。但許多內容與同性戀困境討論多所相似，較少扣緊雙性情慾實

² 文後將提及的第一個雙性戀團體拜坊，一開始便是透過bi版串連集結後所成立。

³ 不過，這並非意味著，雙性戀的發聲僅由拜坊進行。由於同志運動的內涵應包含LGBT，某種程度來說已屬被體制化的定義，因此即便是一開始訴求提供同性戀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如臺北的同志諮詢熱線，或是臺中的基地組織等，在其教育活動中，都多少會介紹雙性戀議題。

踐之特殊性。而就學術期刊論文來看，以雙性戀一詞於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搜尋，自1970至2013年，僅有九篇論文，特別針對雙性戀所寫的文章則僅有三篇。其中《試論臺灣雙性戀者的身分認同、社會處境與情慾實踐》一文，點出在異同邏輯下，雙性戀者往往須採取時而為異、時而為同的策略，來展演其情慾主體（曾漢津、游美惠 2008），是少數能針對雙性戀者如何在特定社會脈絡下展演其雙性情慾的論文。至於專書部分，僅有2007年出版兩本國外雙性戀著作的翻譯書籍，以及2011年一本國內雙性戀者生命故事集結。如果對照於臺灣蓬勃豐富的同性戀研究來看，那麼前述Angelides與Hemmings所說英語世界中缺乏對雙性戀探究的觀察亦應適用於國內。

整體來說，雙性戀「出現」後的發聲與迴響並未如預期，在各項論述場域中，對於雙性戀之持續投入與關注仍是如此有限。而這種既出現又似未現的處境，在學者對雙性情慾論述的進一步分析中，更為顯露。

二、問題意識：中界之處裡的雙性情慾

學者指出，相對於其他非主流性身分研究來看，雙性情慾研究明顯受忽略。然而，除了數量上的缺乏外，更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在既有的書寫與探究中，雙性戀與雙性情慾如何被論述？其所呈現的知識論為何？透過對雙性情慾知識生產的反思，我們發現在雙性情慾相關論述中，往往偏重批判異／同情慾體系，或探掘雙性戀遭遇之困境，但卻較少探究雙性情慾如何被敘說並賦予特定樣貌：⁴

⁴ 以下對雙性情慾理論之檢視，僅以英語世界研究為主，作者特別仰賴Hemmings與Angelides兩位作者的分析與評述。儘管雙性戀研究的出版相對有限，但以下探討仍不敢稱為全面。

（一）雙性戀理論中的雙性情慾樣貌

1.從作為他者到作為基進之情慾狀態的雙性戀

雙性戀常被視為不容於異／同二元情慾架構，但這並不表示過往的情慾論述未曾論及雙性情慾。Angelides（2001）在回顧雙性情慾論述歷史時，便指出從論述的系譜分析來看，異／同二元認同的確立，其實乃透過先建構雙性情慾之存在，繼而將其視為需要被克服、脫離的狀態。亦即，在人類情慾主體發展的論述歷史初期，雙性情慾一直扮演著性認同結構中他者（other）的角色。Angelides以Freud的作品為例（尤其著墨於分析*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一書中對於雙性情慾的相關論述），指出雙性情慾在其理論中被視為一種類似雌雄同體之情狀，也是個人欲建立自身應有性別氣質，並進而成為異性戀情慾主體前必須克服的未分化狀態（Angelides 2001: 62-64）。這意味著，在異性戀體制的霸權下，雙性情慾很早就被建構為一種既被接受、但也不被接受的情慾狀態，所以不僅不應被視為一種獨立認同，且有必要以一種盲點的狀態存在。

依循Angelides的分析，我們注意到，在1990年代中期，這種將雙性情慾視為未分化狀態的論述再次出現，但這次卻以其未分化的樣貌，作為一種基進的情慾表現方式。此類論述可以Garber（1995）所寫的*Vice Versa*做為代表。Garber以Mobius環作為比喻，主張無論從跨歷史面向來看，或從日常生活中觀察，我們都會發現情慾無法被固定在特定異／同認同之上，且處處存在著異／同並存之情慾實踐。Garber以Foucault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一書中提出的論述為基礎，強調特定的性身分以及所謂的性變態都是一種被論述創造出來的物種（species），包括如Kinsey量表中所謂的完全異性戀、完全同性戀或是真正雙性戀（true

bisexual) 等，都是科學論述之產物，由此來看，我們便不應從字面上來理解雙性情慾，視雙性戀為異性戀與同性戀外、情慾朝向二性別的另外一種性取向，相反地，雙所突顯的實乃情慾之流動性，是一種顛覆「性取向」範疇本身的情慾實踐 (Garber 1995: 65)。Garber推崇雙性情慾的情慾流動，是一種不受限於既有異同情慾架構的基進情慾狀態，是人類情慾更自由之展現。但Garber對於所謂情慾流動機制為何？雙性情慾的內涵又是什麼？等問題卻並未有更進一步的討論。也因此，Angelides才會形容，Garber的做法似乎只是將雙性情慾神秘化，但卻未能增進我們對雙性情慾內涵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將雙性情慾視為更大情慾自由表現的論述，也出現在前述所提及國內第一本雙性戀生命故事集中。該書作者在指出雙性情慾如何受異同邏輯所污名後，結論道「……雙性戀者，具有一種滲透能力，以流動與兼容並包的方式，拆除掉原有的框架，描繪出新的慾望地景。……雙性戀……拒絕遊戲規則，永遠質疑『二元對立』這個遊戲的本身」(陳洛葳 2011: 85)。此論述中充滿盛讚雙性戀表徵著情感世界無限可能的論調，但對於何謂情慾流動之內涵，並無進一步分析。

2. 做為異 / 同結構外中界處之情慾狀態的雙性戀

回應雙性戀在非主流性認同論述中的被忽略，以及雙性戀常不被信任，或被視為僅屬過渡階段之種種質疑的社會處境，許多雙性情慾討論因此聚焦於分析，人們如何受限於既有異 / 同邏輯，因而導致對雙性情慾的負面理解。Ault (1996) 便指出，由於雙性戀認同無法以現有異 / 同二分的性認同結構來解釋，因此常引發不信任，亦即不僅受異性戀體制排除，即便是同樣身處非主流性身分的同性戀社群，也出現了許多排斥雙性戀的污名化聲音。這種對於在異 / 同邏輯下雙性戀者櫃中

之櫃的雙重衣櫃處境，是雙性戀研究的常見主題（Firestein 1996; Ochs 1996）。Eadie（1993）也進一步以人類學家Mary Douglas所提出純潔與污染二分概念來詮釋雙性情慾如何被定義。Eadie指出，分類的範疇秩序必然伴隨著對污染的指認，異／同情慾的二分體系，也伴隨著界定了危險的情慾狀態。雙性情慾的受排除正因其在異同邏輯體系中意味著兩種危險：一方面雙性情慾的存在意味著異／同二分體制的傾毀，另一方面，雙性情慾的存在對於同性戀來說，更意味著好不容易在異性戀霸權外找到的非異性戀新領域，將可能因此再次受異性戀污染。歸納來看，異／同邏輯傾向於視雙性戀為非真實的性身分，因而予以漠視；或將其視為一種不穩定狀態，因此不值得信任，甚至導致異性戀與同性戀兩方陣營皆視雙性戀為污染。在這樣的脈絡下，強調雙性戀的存在與被看見、訴求反擊櫃中之櫃以及打破恐雙症等，都成為雙性戀運動之核心訴求（Tucker 1995）。

除了指出異／同邏輯無法解釋雙性情慾外，部分雙性戀者也批判強調超越異／同邏輯劃分的酷兒理論，同樣亦無法解釋雙性情慾。du Plessis（1996）便指出，酷兒理論由於偏重討論情慾的流動性，因而忽略進一步討論性別在其中的意涵，因此要不就是將雙性戀視為一種理論上的退步，要不就是以酷兒之名遮掩了特定情慾議題的差異性（du Plessis 1996: 34-35）。正因為許多學者不斷提出雙性情慾如何被排除在異／同或酷兒論述之外，因此，雙性戀研究重要專書之一Representing Bisexuality的編者Pramaggiore（1996）才會指出：相對於Sedgwick（1990）所揭露同性情慾的知識生產乃依賴建構暗櫃以及由暗櫃生產出的二元體系，⁵ 雙性情慾的知識生產則由藩籬知識論（epistemology of

⁵ Sedgwick在討論同性情慾上，翻轉了在其之前偏重討論同性情慾如何受異性戀規範污名和壓抑的論述方向，轉而致力於指出異／同情慾的二元劃分，如何在二十世

fence) 而形成：亦即在知識生產中，雙性戀向來被賦予懸擱在藩籬之上的位置，既不在特定情慾範疇內，卻也不在之外，而總是落在某處之間 (in-between)、那看似未定之所在。

綜觀前述雙性情慾的理論化，無論是將雙性情慾視為未分化的前發展狀態，或強調其未定著、因此得以顛覆既有情慾劃分範疇體制，抑或是指出雙性戀在異／同邏輯或酷兒論述中如何受遮蔽等，這些論述或貶抑、或標舉、或為雙性戀發聲，但這些(曾)具影響力的論述，對於探究雙性情慾如何被敘說，以及其情慾主體的建構，卻似乎仍並未加以著力。正因如此，Hemmings (2002) 才會延續Pramaggiore的藩籬知識論，進一步延伸指出：既有關於性別與情慾 (sexuality)⁶ 的論述，總是將雙性情慾生產為一種抽象、沒有實際生活的中界處 (middle ground)，此中界處或者被視為一種審視對照，或者做為突顯出其他情慾論述的不足與有限性 (不管是同性戀論述或是酷兒理論的不足)，但雙性戀情慾自身的展現，卻仍較少被探究，亦即論者仍鮮少以雙性情慾的經驗去生產知識，或以此建構特定的主體位置。Hemmings因此呼籲有必要回到雙性情慾經驗本身，以提出雙性戀的理論化。

不過，此中確實有幾位學者採取了以雙性戀者經驗為出發的探究取徑，其中包括量化調查分析，也包括質化探究。尤其是1990年代中

紀後的西方知識生產中扮演核心位置。亦即，藉由暗櫃的建構，界定出內在／外在、公／私、主體／客體等範疇界線，而其中蘊含著各種知識與未識 (ignorance) 交錯形成的權力作用。

⁶ 關於sexuality一字的翻譯，在中文裡主要有性、情慾、性慾特質與社會性等，各翻譯所欲呈現之意涵與相互之論辯可參考連結性一書(何春蕤 2010)當中的討論。Sexuality一字當中包含了性感受、慾望以及各項相關實作，因此作者以為將其翻譯為「性」最為適當，但因本文討論bi-sexuality，若翻譯為性，則雙性性的翻譯不免拗口且難以理解，故選擇以「情慾」一詞翻譯。

期以來三本重要以雙性戀為主題的專書與文集：包括Weinberg等人針對舊金山雙性戀社群所作長達15年之訪談研究而寫成的*Dual Attraction* (Weinberg, Williams and Pryor 1994) 一書，由Firestein主編，偏重諮商探討與社群形成之政治議題的*Bisexuality: Th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an Invisible Minority* (Firestein 1996)，以及社會學者Rust總結美國雙性戀研究的文集*Bisex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ust 2000)。在這三本專書裡，呈現了雙性戀者的出櫃年齡、雙性戀者占人口的比例、雙性戀者與異性以及同性的性吸引、性行為與戀愛關係比例，雙性戀者與各項人口特質之間的統計關係等數據。也透過訪談，呈現雙性戀的情慾偏好，認同發展以及參與社群等各項經驗敘說分析。除此之外，自2000年以來出版的*Journal of Bisexuality* 亦致力於開創以雙性情慾為主軸的相關探究，其中對於恐雙症的量表化探究 (Mulick and Wright 2002, 2011)，人們對於雙性戀與雙性情慾所抱持之態度分析 (Israel and Mohr 2004)，雙性情慾與認同的發展研究 (Bradford 2004)，性別展演以及陽剛氣質等批判性別論述與雙性情慾的關連性探究 (Pennington 2009; Steinman 2001, 2011)，以及點出雙性情慾的論述系譜分析與展演性如何可能與酷兒理論相互增益 (Callis 2009) 等，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矚目並引用。但整體來說，關於雙性戀認同建構與情慾分析之探討，相對來說仍屬有限。

更重要的是，在這些量化與質化的雙性戀經驗探究中，往往由於研究者仍以既有性傾向理論框架為基礎，使得所發展出的雙性戀情慾主體面貌十分模糊不明。例如，研究者以性吸引、性行為與浪漫關係三面向的自我評分，區分出純粹類型、中間類型、異性戀傾向類型、同性戀傾向類型以及歧異類型（兼具異／同性戀二傾向類型）等雙性戀類別 (Weinberg, Williams and Pryor 1994: 46-48)。此劃分方式，雖旨在突

顯雙性情慾多樣性，但仍以既有異／同架構來分類，卻顯得雙性情慾僅能是異／同情慾的混合或加總，反而更突顯出雙性情慾既非純粹同性戀或異性戀的他者意象。同時，我們也看不出調查中的雙性戀認同者，對自身與不同性別的多樣情慾關係，賦予什麼樣的詮釋，而此情慾實踐又與性別體制有著什麼樣的關連性。

無論是偏重批判既有情慾論述之限制，因而鮮少回到雙性戀本身的經驗，抑或是著眼於雙性戀經驗，但又從異／同情慾視框出發，在這些探詢中，雙性情慾總是顯得確實在場、卻也又似乎缺席，而這或許正是雙性情慾最不同於其他性身分的特殊之處，也是引發本研究探詢雙性戀與雙性情慾的出發點。

（二）問題的提出

綜觀以上對雙性戀理論之檢視，顯示出既有雙性戀理論的特色，也引發本文的兩項核心問題意識：

一是雙性情慾的理論化，突顯出雙性情慾身處中界位置，此中界處境有以下兩層意涵：一方面，雙性情慾雖然也如同性情慾一般，必須面對異性戀規範體制的定義性權力作用，視其為「變態情慾實踐」，但即便在非異性戀的性少數群體中，卻也同樣被視為是一種可能污染同性情慾陣營的危險狀態，這意味著，雙性情慾總是被界定為非屬此類，因此不被肯定為一性認同；另一方面，雙性戀理論也因此偏向於致力突顯異／同情慾架構或是酷兒論述在討論雙性情慾上的有限性，反而再次將雙性情慾抽象化。此中界處境理論反映出過往探究情慾認同與實踐之論述中的一項核心問題，亦即，無論是反擊異性戀霸權體制以爭取同性情慾正當性，或是進一步挑戰異同邏輯之批判，雙性戀者都難以在這些論述

中獲得主體位置，雙性情慾主體的實踐探究也因此而被略過。由此看來，此中界之處論述正突顯出我們應探究雙性戀者如何在此處境下建立性自我的必要性。而以此提問為前提，本文進一步主張，雙性情慾的中界之地處境，確實為雙性戀者建立性認同的首要結構性脈絡，但所謂的中界處境，不應被視為一普遍性的同質概念。由於性認同並非一種本質的確立，而是在特定社會脈絡中，各種情慾身分之關係性位置的確認，因此不同社會脈絡中對於異同情慾以及其他性身分的不同論述運作，也將生產出不同的中界境況。因此，我們有必要分析，**在特定的情慾論述環境中，自我認同為雙性戀者如何詮釋個人認同⁷與其他較優勢、可見之性身分的關係，而此詮釋中所仰賴的論述資源又為何。**

二是現行的雙性情慾理論化，或者延續異同邏輯，但強調情慾對象的性別無須單一，抑或者依循酷兒論述，因此賦予雙性情慾必然超越結構限制之地位，二者都未能回到雙性情慾經驗自身。因此，當我們嘗試理論化雙性戀與雙性情慾時，一方面應超越異／同框架，不以情慾對象之性別做為理解情慾實踐的唯一依據，另一方面也應避免直接跳入酷兒理論情慾流動的論述，忽略性別體制對情慾實踐的影響。**透過回到雙性戀的自身情慾經驗詮釋，重新耙梳探究雙性情慾實踐中所啟發性別與情慾二者之間的各項關連性。**

從以上問題意識出發，本文嘗試將雙性戀者經驗帶回雙性情慾研究中。但所謂重視經驗，並非主張有著雙性戀經驗的本質，而是將經驗視為一種意義詮釋，探究在這些意義詮釋中，個人建構出什麼樣的性自我

⁷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多位受訪者並未抱持著單一性認同，亦即，可能同時認同自己是同性戀，也是雙性戀，抑或是跨性別者，因此以下對於認同建構的分析，並不意味著必然放棄或否定其他性認同。此現象在下一節討論性認同地景時，有進一步說明。

(self)。⁸ 也由於重視意義詮釋，因此在雙性戀身分認定上，著重於採取雙性戀認同者（無論其是否曾有與不同生理性別的情慾經驗）如何詮釋自身認同？⁹ 他們的認同建構與詮釋，可能帶給性身分與情慾理論什麼樣的啟發？具體來說，這包含著下述三項提問：

1. 在異 / 同邏輯框架及其他情慾論述下，自我認同為雙性戀者引用什麼論述資源建構自身認同？其建構歷程中的敘說生產，如何關連與社會脈絡？

2. 雙性情慾常被視為逸出異 / 同邏輯，那麼，雙性戀者的認同建構，可能如何擴充我們對於既有性身分地景的理解？

3. 雙性戀者的情慾實踐敘說，如何啟發我們重新看待性別（gender）與性（sexuality）之間的關連？

⁸ 這裡選擇用性自我而非性主體（sexual subject），乃因為本文之分析重視個人對於自身性身分與情慾實踐所產生的自我敘說，尤其如以下第三節分析指出此雙性戀認同的建立乃體現出現代性的自我建構大業，故認為自我一詞更妥切符應本文的討論旨趣。但這並不意味著雙性戀的性自我即等同於雙性戀者在現代性脈絡下的自我認同建構，而毋寧說是現代性的自我反身性特質，影響著個人在多面向上（如性別、階級、族群與生活風格等）的身分建構，性身分也包括在其中。

⁹ 研究者的此一提問，乃受啟發於Giddens所提出的現代性（modernity）分析（Giddens 1991）。Giddens主張所謂現代性的社會生活，其形成有三項主要動力因素：第一為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意指社會生活的組織由特定時空參照下跳脫，因而造成時間與空間的空洞化；第二為社會制度的抽離化（disembedding），意指將社會關係由特定的地方脈絡下抽離，第三項則為現代性的反思性（reflexivity），意指社會活動以及人與自然的關係不斷依據新的訊息做出各階段修正。在此三項動力因素影響下，既有的時空意識與社會制度變得不再穩固，也促使現代性脈絡下的人們，必須不斷回應外在論述脈絡，持續進行自我定義的認同打造歷程。在本文後續分析裡，我們將看到此項特質清楚地表現在雙性戀的自我打造上。

（三）研究歷程說明

本研究執行於2012年至2013年，¹⁰ 研究者首先透過性別課程與講座活動，接觸到部分研究參與者，並進而以此進行滾雪球抽樣，一共訪談了16位自我認同為雙性戀者，其中5位生理男，11位生理女，年齡分佈於23至35歲間，教育程度皆為大學畢業以上，居住地分別為臺北、臺中與高雄三個城市。訪談時間多為一次2小時的訪談。但也有五位受訪者，接受了第二次訪談。就雙性戀社群的參與而言，16位當中有9位曾參與雙性戀組織——拜坊，6位研究參與者為其他性別運動組織成員，僅有1位未曾參與任何性少數運動組織。而即便有9位拜坊成員，但由於拜坊相對來說是一個成員流動高、無定期聚會的組織，¹¹ 因此在本研究執行期間，仍持續參與拜坊者僅有5位。由此來看，雖僅有少數比例受訪者身為雙性戀社群成員，但整體而言，受訪者卻明顯具有關心性別議題且具備高文化資本等同質性。此同質性雖非研究者所期待，且在滾雪球抽樣時，也刻意希望接觸更多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但一方面顯然性別課程與講座的起點，左右了後續參與者特質，另一方面，以目前雙性戀論述並未擁有高能見度的臺灣來說，研究者以「以雙性戀身分自我標籤者」為邀請原則，也影響了可能的參與者範圍，因而形成研究之限制。

而在資料蒐集與分析上，深度訪談提問主要以下述五項問題為核心：（1）個人如何建構自身雙性戀認同，（2）在不同人際互動中，如何標示個人性身分？出櫃對性認同有何影響？（3）個人如何看待與回應情慾流動論述？（4）性別對於自身情慾經驗影響為何？男雙性戀

¹⁰ 研究執行期間為2012.08.01-2013.07.31。

¹¹ 其舉辦活動頻率在本研究執行期間大約為1-2個月一次。

與女雙性戀是否且有何不同？（5）對於臺灣雙性戀運動發展的看法為何？針對所蒐集的訪談資料，則歸納出以「個人的自我認同描述」、「認同建立歷程」、「性別觀念與情慾實踐」以及「性身分標示」等四個範疇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三、雙性戀認同的建構和實踐

如前述指出，既有論述總是將雙性情慾放置在中界之地，不具明確內涵，也顯然不屬於其他特定性身分，因此雙性戀認同的建立，便必須面對與其他性身分之關係性位置的確立，那麼此關係劃界的認同敘說如何形成呢？

透過訪談我們發現，儘管一般來說分析雙性戀的情慾經驗包括性行為、性吸引力與浪漫情愛感受等三層面（Weinberg et al. 1994），但本研究中的受訪者，在認同建構歷程中，都是因為經歷對兩個性別的情愛感受，而開啓對認同之探索，相對而言，受訪者鮮少在其認同敘說中提及性行為實踐對認同建構的影響。¹²事實上，早在1970年代Blumstein and Schwartz（1977）的研究便已指出，性行為與性認同之間並無必然關連性，這意味採取雙性戀性認同者，彼此可能有著相當不同的性經驗。本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亦呼應此現象，亦即，儘管十六位參與者都自我描述為雙性戀者，但卻各自有著十分不同的情慾經驗：包括半數受訪者分別與生理男性和女性皆有過性與情愛互動、數位受訪者則僅經歷過與單一生理性別的性行為、而所謂對兩個性別的情愛感受，其對象也包括跨性別者，另外，少數受訪者雖有過戀慕心情，但至受訪為止，從未有過性

¹² 唯一例外的是，與跨性別者之性行為經驗，影響受訪者重新思考性別與性行為實踐的關連性，這部分在本文的第五節將有所討論。

與情愛關係的經驗等。

然而，儘管有上述相異，但幾乎所有受訪者仍都經歷透過劃分自己不是異性戀、也不是同性戀的劃界建立過程。這一方面反映出異／同邏輯在情慾論述中具有支配性，因此得以影響個人性認同形成，另一方面也呼應爲什麼Bradford（2004）的研究，會指出雙性戀者常感受到，說自己是雙性戀這件事，與其說是向別人回答了你是什麼，吾寧說較是告訴別人你不是什麼。但僅僅指出雙性戀認同的建立在於畫出與異／同情慾的區別，仍過於簡化雙性戀認同建立的歷程。從受訪者的訪談中，我們發現，在此畫出界線的主體認同敘說建構中，其劃界之參照以及劃界行動之驅使動機，深刻地反應出關於非主流性身分的社會脈絡。亦即，一方面臺灣性別平等運動脈絡，使得劃分不是異性戀與不是同性戀的這二項詮釋有著非常不同的歷程；另一方面，現代性的脈絡，也驅使人們去不斷費心分辨既有異同結構是否適用自身，進而促成雙性戀認同得以確立，這使得雙性戀認同的建構歷程，不僅是一種劃界，更是Giddens所說的自我反身性計畫大業之實踐（Giddens 1991）：

（一）參照同性戀群體而建構的雙認同

雙性戀的中界處境，使得雙性戀認同的內涵常以「非屬此類」的劃界方式被陳述，研究中好幾位受訪者在確立雙性戀認同前，都曾經歷知道自己不是異性戀也不是同性戀，但卻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的階段。但進一步探究此建立不是異性戀與不是同性戀這兩道築籬之過程，則發現二者的明顯不同。

在受訪者的經驗裡，我們發現，當雙性戀者敘說自己不是異性戀時，其過程正如同多數同性戀者所經歷一般，往往承受了異性戀規範體

制帶來的強大壓迫力量。生理男的阿眷在中學階段發現自己喜歡上男生，由於無法接受喜歡同性的自己，但卻又壓抑不住自己的情感，引發心理極大衝突，加上後來同學發現他的情慾對象為同性後，又對他多所抵制與指責，因而出現嚴重身心症，不時有換氣過度症狀，體重也掉了六、七公斤。更惡性循環的是，由於同學的排擠引發他強烈負面情緒，他開始偶爾會有突然在學校大哭大叫的行為，如此一來又導致同學向老師抱怨他影響了大家唸書，因此阿眷說他後來「我有點像是被隔離一樣，就被叫去輔導室坐著」。在回憶這個歷程時，阿眷形容：「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生不如死，我都不知道我高三的時候到底是怎麼活過來的？」（阿眷，2013/03）而小魚在青少年時期第一次聽老師談到同性戀一詞時，儘管當時僅有模糊同性情慾感受，但異性戀霸權的作用已足以讓他感到恐懼。他回憶「我那時候第一次聽到原來我身邊會有同性戀這件事情，真的很驚嚇……那天回家我就立刻把倉庫底下的塔羅牌拿出來……然後就問說我會不會變成同性戀，那時很擔心自己會不會有一天變成了同性戀」，也因為如此，當不久之後，小魚越來越明確感覺到自己喜歡同性時，便一度感慨「自己走歪了」（小魚，2012/12）。這些認同歷程都映證了異性戀體制在雙性戀認同形成歷程中產生的壓迫，也說明為何當同樣必須對抗異性戀體制壓迫的雙性戀，仍必須面對同性戀群體質疑時，對於自身雙重衣櫃處境會產生的深切感慨。但除了此受壓迫經驗外，進一步來看，我們會發現值得注意的是，當受訪者確立自己的非異性戀身分時，所指涉的往往就是性傾向的不同，其中對照的差異主要包括性行為、性吸引力與情感關係三種層面的比較。但是，當受訪者要形成自己不是同性戀的自我敘說時，除了檢視自身同性情慾外，便往往還進一步將同性戀社群所表現出的文化樣貌做為自我描述之參照，以及包括比較雙性情慾與同性情慾在受壓迫處境上的差異。

1.與同性戀社群次文化的相對照

相對於一般認為性認同乃立基於情慾行爲，訪談中的受訪者在察覺自身同性情慾時，卻往往並非僅嘗試確認自身同性情慾是否存在，而是透過接觸同性戀酒吧、或是網路同性戀社群來對照自身與該社群成員是否相似。如一直以來都以爲自己是異性戀的生理女小龍，在偶然發現自己對女生出現強烈情慾吸引力時，直覺反應便是想辦法接觸女同性戀社群，「……我跑去同志餐廳打工，可是我就只看到了T跟婆，然後我發現了，我其實不是T我也不是婆，所以我並沒有認同我自己是女同志」（小龍，2013/02）。前述提及的生理男阿眷則是在進一步覺察自己喜歡男體後，嘗試到網路上參與男同性戀社群，但卻發現言談互動過程中充滿性和身體相關攻擊的對話風格，讓他覺得不自在且不由自主武裝自己：「……就是他一定要用嘴巴很賤的去苛薄你……對，然後就是開你身體上的玩笑，……好像還要經過面試一樣，然後才變成gay裡面的一個」（阿眷，2013/03），這種攻擊雖然沒有讓阿眷當下拒絕同性戀身分，但也讓他繼續在網路中尋找自我認同，並在之後因接觸雙性戀團體確立了自己的雙性戀認同。而生理女小魚對於自己的性身分認定，更曾經一度完全參照著網站上的女同性戀社群，「一開始我覺得自己是婆……可是後來有天突然出現了個不分（指網路上），……然後因爲我每次看到那些標示自己是婆的那些女生照片，我就想說，怎麼都這麼正啊？所以就想說自己又不正，然後又短頭髮、也不太會穿衣服，那我還是當不分好了，我應該是不分。」但後來小魚也同樣透過這樣的社群參照，拒絕了同性戀身分「可是後來……我開始覺得我跟女同志很不一樣……就是，女同志很喜歡設一些規定，比如說你要多陽剛才是T……或是不分聚會就會設定說來的人你頭髮不可以太短……我覺得我不是喜歡設那麼多規定的人」（小魚，2012/12）。

從以上的歷程可以發現，雙性戀者在與同性戀社群接觸時，對照的遠遠不只是社群裡的情慾特質，還包括對照社群的言論風格、穿著與互動方式等等。這顯示同性戀並非如異性戀般僅是一種性身分，更是一種具特定樣貌風格的次文化群體。但這裡我們要論證的並非同性戀社群文化之樣貌，無論受訪雙性戀者在捕捉同性戀群體文化時，其捕捉之意象是否真能反映出該群體，但關鍵在於，他們都感受到同性戀社群有著一個特定鮮明的次文化，且此文化成爲建構自身性認同的論述資源。也因為對比同性戀身分上有著這樣的次文化指涉模式，因此在確立自己的雙性戀認同時，便不免依循此模式，但這樣的歷程卻又更突顯出雙性戀認同建構的困難。所以小魚在回顧自己的雙性戀認同建構過程時才會說：「要去認同雙性戀是比較困難的，因為雙性戀沒有任何具體的社群跟形象……如果說他是有個標籤，那麼那個標籤太容易掉了，風一吹就沒了……因為他形象不明啊」（小魚，2012/12）。小魚的話不僅反映出性少數的性認同建構並非僅關連於情慾，而是與社群密切關連，也突顯出雙性戀的中界處境，使其認同建構不得不轉爲對照在臺灣社會中發展有所成的同性戀社群。於此同時，也正因爲缺乏特定形象（但這裡不意味著此特定形象有其必要），因此雙性戀認同中所蘊含的內涵，便很容易地轉爲偏向由個人認定，這一點在以下討論雙性戀認同與現代性之關連時，會再進一步說明。

2.與同性戀受壓迫處境的相對照

由於同樣爲非主流性身分，因此，研究也發現在建立雙性戀認同過程中，雙認同者對於同性戀身分的拒絕，往往也同時包含對受壓迫處境的對照。亦即因爲意識到受壓迫處境之差異，因而更感受到自身雙性戀認同的特殊性與明確性。

對於性別理論感興趣的吳昕，由於受性別理論影響，因此一開始本來相當排斥雙性戀標籤，所以儘管很早便分別有過和男生與女生的情慾互動，但他卻拒絕了雙性戀身分。「那時候唸越多性別研究的東西，就越不想要雙性戀這個詞……覺得它好像又侷限在那個男的女的框架……那時候大家都會談你的認同是什麼，我的狀態是我知道我會喜歡男生也會喜歡女生，可是我就說我覺得我不是雙性戀，我不想要用雙性戀這個term」。然而，由於不斷感受到雙性戀與同性戀處境的差異，作為生理女的吳昕在受壓迫處境的對照下，轉而確立了雙性戀認同。他提到「我姊他是拉子，他是看起來就很T的那種，然後我媽也漸漸知道這件事情，那我覺得我媽對於……這兩個女兒的反應就完全不一樣，……她好像就放任我姊，也不會說，拜託你，你變正常或什麼的……但她就會試圖想要改變我，叫我跟女生交往就玩一玩就好，還是要嫁人」（吳昕，2013/01）。尤其當吳昕開始向他人表示自己接觸雙性戀群體，卻發現即便跟他一樣熟悉性別理論且關注性別平等議題的伙伴，也同樣會質疑他為什麼有必要特別提出雙性戀身分時，他更加意識到雙性戀的處境不如同性戀，也更意識到雙認同的重要性。

除了不被肯定為一獨立性身分外，雙性戀常被視為性放任的污名，也成為與同性戀身分劃分的重要界線。生理女溫溫的生活場域常有與同性戀圈互動的機會，透過互動，他觀察到在非主流性身分團體中，或許因為強調突破既有性/別體制，因此在情慾話題上往往相當解禁。然而，他注意到當男、女同性戀各自談著男男與女女的情慾時，各種性玩笑飛舞伴生，大家都可自然接受，但當雙性戀者要去談兩種對象的性時，場面氣氛就容易凝結，「……我覺得就算在一個很常談性的環境下（指同性戀圈），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習慣。……像在一個女同志的環境裡面，原本是情慾橫流的地方，可是……如果我在這裡承認我很enjoy

男性的性，這樣做是很不受歡迎的。我其實是把汙名往身上一貼」（溫溫，2012/12）。這顯示在非異性情慾的場域中，潛藏的性階層壓迫仍存在，亦即，即便在得以被解禁的豐沛性言語裡，仍必須維持情慾對象性別上的單一，而跨越單一性別的性仍傾向於被定位為情慾上的「過多」，因而受負面評語。這正是為什麼Rust（1996a）的跨文化雙性戀研究會指出，特定文化對性的態度越正向，那麼該文化接受雙性戀的可能性便越高。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雙性戀者會感受到，即便與同性戀同樣逾越了異性戀霸權體制，但雙性戀仍明顯比同性戀多了一層性的污名。而也就在此性污名壓迫的對照中，雙性戀者感受到自身與同性戀群體的藩籬築成。

以上受訪者認同建構中與同性戀身分的劃界敘說，體現出不同性身分在特定社會脈絡中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在臺灣同性戀運動持續多年的脈絡環境中，不僅社會場域與網路空間中發展出活絡的同性戀社群，其性身分也被生產出挑戰異性戀霸權壓迫的運動意涵，這意味著同性戀已然超越性身分，而有著其他附加意涵相緊緊，也因此雙性戀在參照同性戀此性少數群體時，並不僅著眼於二者情慾實踐的比較，更將其視為次文化群體，以及一種受壓迫之政治意涵上的相對照。透過這些對照，雙性戀摸索出自身認同，而這個摸索歷程也映證出，雙性戀認同的建構，是如何地與臺灣非主流性認同運動產生關連性。

（二）自我反身性志業驅使下建構的雙認同

雙性情慾的藩籬知識論，指出雙性戀總被安置在未被定義的藩籬位置上，而本研究中多位受訪者與其所建立的臺灣第一個雙性戀團體拜坊的經驗，卻將此未被定義的雙性戀位置，翻轉為個人得以定義自我

的自主空間。這個翻轉捨棄了所有既存的性身分劃分依據，轉由個人的主觀意願與詮釋作為建立認同的基礎，於是對於自我追尋與自我實現的信念，成為認同建立的核心敘說。在這樣的模式下，雙性戀性認同建構的驅力，竟意外地引用了非性身分相關的意識型態作為重要論述資源。本文認為此認同建立的機制，恰恰符映了Giddens所主張：反身性（reflexivity）為現代性之重要特質，而在高度現代性的脈絡下，自我認同建構也就成為一個不斷進行自我觀察、探索的敘事建構大業（Giddens 1991）。我們可以從分析拜坊這個組織的運作與成員的認同敘說中，看到此雙性戀認同建構做為現代性氛圍之體現。

檢視拜坊與國內同志運動對於雙性戀的論述，二者之間明顯有一重要差異：不同於一般常見，也是前述認識同志手冊最常採用的雙性戀定義「愛戀與情慾的對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異性」，拜坊對於何謂雙性戀則強調「只要個人認為他自己是雙性戀，那他就是」這樣相當廣闊的定義。儘管Esterberg（1997）指出，多數雙性戀者皆較能容忍性認同方面的模糊性，且分析其原因部分源自於雙性情慾相對來說未被體制化，亦即關於「作為雙性戀」並沒有一定的說法，也因此無規則可依循，亦較無刻板印象限制。但細究拜坊的廣泛雙性戀定義，卻有著Esterberg所指出低體制化外，更進一步的理由。

拜坊之所以採取「由個人自行認定」之定義，根據組織者回顧當初組織成立歷程指出，此定義乃2007年時社群內部經開會討論後所一致決定。而即便至今，無論是仍為組織成員，或是已鮮少參與該組織行動的受訪者，在談到雙性戀定義時，都仍強調「只要他說自己是，那他就是」的說法。

小達形容自己參加拜坊時，是自己人生最為徬徨的階段，他在受訪時，認真地拿著一本心靈成長書籍（《心靈的本質》）告訴我，他的認

同與這本書密切相關，而念此書時，他同時也參加了拜坊。他對當時團體的描述是「我覺得有點物以類聚，我們bi裡面的團員，幾乎每一個人都認同bi這個定義是要自己去定義他，不只是bi，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是獨特的，所以我們就是覺得，這個定義應該是自己去定義而不是這個社群給你定義，不是這樣子！」在小達的說法裡，性認同的建立與個人生命的自我追尋被明確地建立起關連：「我發現真的很妙，就是我們bi the way裡面的人啊……原來大家都在找自己，每一個都在找自己啊！你知道嗎，即便是當時或是後來離開的每個人……我覺得……就是其實都是在找自己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小達，2012/11）小達甚至進一步形容參加拜坊對他來說是一個解答的歷程，而當我問到他離開時帶的答案是什麼，小達毫不猶豫地說「做自己」（小達，2012/12）。正是因為致力於自我探究，因此即便作為生理女的小達從未與男性交往，甚至對日常互動中男性的父權式言行多有批判，但他仍看重、仔細分辨自己經歷過的情慾感受，包括對於他所謂難得一見、兼具細膩儒雅特質之男性產生的仰慕，並依此建立了雙性戀認同。

小達對拜坊組織特色的詮釋，也印證於拜坊成立時所舉辦的團體活動。拜坊成立後兩次吸引不少人數聚會活動的活動標題與介紹分別寫著：「如果你的心靈想要飛舞、情慾正在流動 如果你想要探索自我……歡迎加入我們……將以……肢體律動和冥想探索自己的身體……」¹³ 「活動將帶領大家認識自己……尋找心中的平衡與依歸」¹⁴。從這兩段介紹文字，明顯可以感受到成長團體的氛圍，呼應了Giddens在*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一書中（Giddens 1991），引用了許多自我治

¹³ 此為該組織的活動公告說明，<http://bittheway.pixnet.net/blog/post/21499512>

¹⁴ 此為該組織的活動公告說明，見<http://bittheway.pixnet.net/blog/post/18708903>。

療的心理諮商討論，來支撐其現代性中自我反身性大業實踐的主張。

事實上，在我一開始閱讀拜坊如上述的活動介紹以及與其成員訪談後，很快便注意到拜坊類似心靈成長團體的特色，而當我向該組織現任總召提出這個看法時，他先是驚訝於我的印象，但也隨之回應「bi the way的人要嘛就是搞靈修，要嘛就是去念諮商，要嘛就是幾乎都有宗教信仰，我覺得這個一定不是偶然的事情……我的猜測啦，就是在這種社會環境下，會……覺得自己是雙性戀的人，都是那種對於探索自己更多樣貌有興趣的人，他不會安於人家給定的樣子」。或許也因為組織的運作帶著濃厚的心靈成長意味，因此小龍在分析拜坊與其他組織的不同特色時便說道：「在我們團體裡面……我們很少用革命情感這幾個字，來讓人特別凝聚……我們也不太會說要去對抗誰，我們比較用的就是做自己，……以這個為一個很大的主軸」（小龍，2013/02），而團體成員阿島甚至解讀道「這個團體本身給予每一個人很多的空間……去讓你認識自己、定義自己，……因為進入這個團體本來就不需要有一個很堅強的認同」（阿島，2012/08）。

從上述詮釋中，我們發現拜坊從成員的參與歷程，到組織活動規劃，以及組織動員特色等，在在顯示出現代性中自我打造的任務實踐特色。也因為強調自我打造，因此將雙性戀的內涵開放性留給每個成員，此現象突顯出一個特色，亦即對比關注美國雙性戀運動的學者Loftus（1996）所強調，雙性情慾實踐有著太多樣貌，實無法以一語彙予以涵蓋，因此雙性戀此概念應僅限於政治目的下運用，而即便做為政治運用，我們仍應重視雙性戀運動中是否出現賦予雙性情慾特定意涵而造成的壓迫，臺灣的雙性戀運動卻反而將雙性戀認同的無特定樣貌，做為標舉之特徵。由此看來，臺灣的雙性戀運動，雖強調訴求雙性戀此一身分的認同政治路線，但在內涵上又依著現代性實踐的路徑為雙性戀內涵劃

下最大限度，這也似乎再一次顯示出，性認同受社會脈絡框架而產生的拼貼性質。

前述拜坊成員與其群體運作所呈現的性認同自我打造現象，有兩點需要進一步說明：首先、雖然此處的討論與詮釋，主要引用拜坊現有與過去成員以及其活動訴求為分析文本，但研究中的其他受訪者，儘管未明確引用「做自己」之論述，但由於意識到雙性戀情慾實踐的多樣性，因此也都對於雙性戀身分的內涵採取寬鬆開放之態度。例如，小魚過去會認為所謂雙性戀應該是「可以喜歡男生也可以喜歡女生，可是他還要認同自己是雙性戀，而且是那種有到近似pride的」，但後來當他與更多的性少數者互動後，對雙性戀的定義也隨之轉變。在訪談中談到自己身邊有著多樣的雙性戀樣貌時，他表示自己以前都會攻擊那種不和自己定義的雙性戀，但後來「我就比較不會去攻擊這種事情……因為可能我自己已經開始覺得，就是這是他自己的事情，而且我經歷過那個階段，我知道要去抓到雙性戀認同是困難的」（小魚，2012/12）。而溫溫也自陳因為有過喜歡跨性別的經驗，因此更覺得難以給予特定的雙性戀意涵「一定要細談之後，我才可以告訴你雙性戀有很多種可能，也不是每個雙性戀都可以這樣長得像我一樣，我也不能代表雙性戀」，因此溫溫才會說「使用雙性戀這個名詞，大概就是屬於一種個人策略的選擇」（溫溫，2012/12）。其次，此性認同自我打造特質，無論在個人層次或是團體層次上都可能引發特定的影響：在個人層次上，這樣的性認同風格似乎促使個人在自我認同上，採取更為開放的態度，例如，過去認為女生不應有太多性慾，因此長期以來以自己性慾為羞恥的生理女左巴便指出「過去我是非常自責的，我會覺得我的性慾這麼強是不好的，我有婚前性行為是很糟的」，但他覺得在建立雙性戀認同歷程中，越來越了解到個人在性與性別的多樣性，因此更能正向看待自己的性慾。而在拜坊

的團體運作層次上，當建立認同相當程度來自於生命自我追尋的風格，那麼似乎也就無可避免地伴隨著成員在完成自我追尋後便淡出團體之現象。研究進行時該團體的現任總召便如此詮釋成員的高度流動：「為什麼拜坊的人會來來去去……我覺得一個滿重要的原因是，當你有需要認同的時候就會去……所以他今天在我們團體取得認同已經完成的話，他當然就不會繼續來了。」這位總召所說的話，某種程度也反映出，該社群所採取的雙性戀定義方式由於太過廣泛，且訴諸個人自我實現，因而使其難以成為集體政治行動的認同基礎。但上述兩項推論，亦即，特定性認同論述如何影響個人其他自我認同面向，以及如何影響其社會運動立場，甚至社會運動效果，皆仍有待進一步探究。

正如雙性戀研究者指出，雙性情慾總是被以對照於異／同情慾或酷兒理論而論述，本研究中雙性戀者的認同建構，也體現於如何詮釋自身與異／同情慾架構關係的自我敘說中，尤其是與同性戀群體的對照，對雙認同來說更為重要。儘管自1970年代以來，受Foucault論述／權力取徑啟發的論者已指出同性戀實為一被建構之性身分，但正如學者所指出，從互動建構論的角度來看，即便此身分乃建構而成，但既被建構了，便可能在社會生活實踐中，成為一種客觀的存在，與人產生互動（甯應斌 2007）。本研究中雙性戀者的認同敘說中顯示，在臺灣的性別平等運動脈絡下，同性戀此一性身分成為一種具次文化與政治性意涵的客觀性存在範疇，與個人的自我敘說進行互動，成為影響雙性戀者的認同建構的重要參照。而雙性戀者的此一不斷交互參照的歷程，則同時反映出現代性社會氛圍下自我敘說建構的驅力。

然而，建構雙性戀認同，並不必然意味著拒斥其他性身分或標籤，研究中雙性戀者的性認同內涵，往往尚涵蓋對其他性身分的詮釋，透過這些詮釋，也讓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臺灣社會呈現的性身分地景。

四、雙認同實踐下的性身分地景

性地景 (sexual landscape) 意指在特定社會脈絡中，人們對於性的感知與想像。其中包含性如何被定義與評價，什麼樣的性被賦予正當性，以及個人如何描述自身的性身分等。Pratt (1982) 指出，自 Foucault 指出性的知識與主體之如何在論述中被生產以來，便啟發學者探究不同社會脈絡如何生產出不同的性身分地景；而特別針對其中的性身分來談，Rust (1996b) 則指出當社會脈絡改變，各種性少數身分得以發聲，將促使性身分地景有所轉變。由此看來，當雙性戀情慾的論述透過同志運動逐漸可見後，也可能影響著既有的性身分地景。

對於雙性戀如何影響既有的性身分地景，雙性戀論者各有不同主張，有的學者批判過往的性身分地景為性別化概念，因此產生異 / 同情慾架構，而雙性戀情慾實踐所提出的同一異一雙三元模式則得以顛覆既有性地景 (Rust 1996b)；另外，也有學者藉由批判異 / 同邏輯無法解釋雙性情慾，因此主張以酷兒吸納所有非異性戀性身分，提出異性戀與酷兒的區分，但此劃分方式隨即被批判忽略各非主流性身分間的差異處境 (Kaplan 1995)。如前所述，雙性戀的認同建構乃體現在與既有情慾身分關係中，而此關係的建立則反映出所在之社會脈絡，在探究雙性戀者如何看待性身分地景中的其他性身分時，我們再一次發現此社會脈絡的框架作用，也因此分辨出不同於前述英語世界論者所提出的性身分地景。

(一) 性身分地景中的新身分：「同志」創造的迴避與結盟

研究中雙性戀者在闡述自身性認同時，除了標誌自己的雙性戀身分

外，多數受訪者都提到了自己在生活互動中常採取的另一個身分「同志」。但有趣的是，當受訪者在主張自己是同志時，往往伴隨著向我強調同志的概念乃包含雙性戀，正如阿眷急切地說：「雙性戀就是同志，同志也是雙性戀」！這種強調同志此身分不應被同性戀所獨占的澄清，在受訪者的敘說中屢屢出現。要理解此一現象，我們有必要先對於這中文世界裡獨有的「同志」認同加以探究。

根據學者分析指出，同志一詞於90年代後在臺灣開始普遍被採用有關，此一詞來自於香港，其由來原取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以及凝聚「有志一同」者共同加入的說法，以號召非異性戀者。¹⁵但由於一開始是由臺大學生社團gay chat引入該詞，以將其社團翻譯命名為同志工作坊，在這樣的脈絡下，同志於是隱含等同於歐美脈絡中的gay，這顯示同志一詞在臺灣最初的引用上是與同性戀密切相關的（趙彥寧 2000）。不過，隨著同志運動發展，同志一詞在運動的公開論述上，也轉而被用以同時指涉同性戀認同之外的其他性身分，其內涵被擴大為涵蓋LGBT，以展示在差異政治訴求下所要求的含括性（inclusion）。

然而，同志做為一符指在同志運動發展下所形成的擴大指涉，並不一定成為日常慣行語言。這一點可以從歷屆的認識同志手冊中看出端倪：在2003年，《認識同志手冊》第一次將雙性戀加入時，該年手冊將「同志」一詞解釋為「各種不符合異性戀主流價值的性少數的代稱」（認識同志手冊編輯小組 2003: 8）。在手冊中標題為「重新思考『同志』意義」之編者的話中，也說道「……把長久以來被「同性戀」佔據的「同志」一詞，努力地讓出位置，使更多在性／別領域中更邊緣、更

¹⁵ 學者因此主張，香港學者與運動者創造同志一詞，原是為了翻譯queer，而非後來所普遍認為的同性戀（趙彥寧 2000）。

弱勢的族群，得以一起來分享「同志」一詞」。在這一段話語，看得出同運所呈現具差異政治批判之反思，不過，這樣的反思並不同順理成章地實現為慣常用語之轉變。所以不僅手冊中在定義T吧與Gay吧時，還是將其定義為女同志與男同志酒吧，而非女、男同性戀酒吧；在隔年手冊裡，也將同志的定義改為「同性戀者的代稱，泛指廣義的同性戀族群，可擴充解釋為各種不符合異性戀主流價值的性少數的代稱」。這個以同性戀為主的同志解釋也一直為後續手冊所沿用。從嘗試將同志等同為廣義各種性身分，到說明其泛指同性戀，但可**擴充**納入其他性少數（粗體為作者自加）。這樣的轉折意味著，其他性少數身分仍處於本非所屬，但可被加入的狀態，同時也意味著，同志一詞在臺灣的脈絡中有了雙重意涵，一個是差異政治下被彰顯的LGBT，另一個則是在許多文本與日常對話中所沿襲的既有用法意指同性戀。

如同Rust在研究性認同轉變時所分析，特定社會脈絡下可得的語彙，是建立新認同的重要條件之一（1996b），前述所談同志的雙重意涵，也創造了雙性戀者採用同志一身分的特定空間。但僅以同志的意涵被擴大為包含LGBT，因此雙性戀者也得以此做為自我認同，這樣的說法並不足以描繪同志運動中權力差異牽動雙性戀者對此認同運用的細膩意涵。雙性戀者之所以採用同志此身分，一方面是既然同志涵蓋LGBT，那麼說自己是同志便不違背自身雙性戀認同；另一方面，也因為在目前的常見文本與日常對話中，多數人仍將同志等同於同性戀，因此採用同志身分又得以使雙性戀者迴避掉並不打算回應的質疑，以及與同性戀群體的正面交鋒。此同志身分得以被運用其雙重意涵的現象，使得雙性戀認同者，在與性少數圈內人互動中，更常以同志做為自我揭露的性認同。生理男的青文就說道：「比較吊詭的是……其實我過去有好一段時間，就是從我研究所開始接觸雙性戀團體以來，我都是用雙性戀

的身分出現，可是後來我在男同志的社群裡就不會這麼的……高調，就不會這麼的公開這個身分……我會說我是同志，我覺得就是帶過……可是我不會用男同志說我自己！」（青文，2013/01）在青文說法裡所區分「同志」與「男同志」的一字之差，或許對許多人來說差異並不顯見，但對青文來說，此用字卻有著重要的自我認同意義：不用男同志，是因為男同志一詞幾乎毫無疑義的等同於男同性戀，因此這是不願以男同志的說法否定自身雙性情慾的潛在堅持；但於此同時，宣稱自己是同志，卻也可避免所謂的高調，亦即掉入櫃中之櫃的出櫃處境。正如中慈談到與同性戀者互動時所說：「我就講我是同志更好，包含LGBT，他們其實就直覺認定我就是gay，對，然後我也不用多做解釋。比較輕鬆。」（中慈，2013/03）

儘管以同志一詞來涵蓋雙與同身分是華語圈的特殊用語，但在英美語世界，也並非無類似的例子。Ault（1996）在分析美國女雙性戀經驗時便指出，許多雙性戀者往往宣稱自己是dyke，並界定dyke為任何非異性戀者，尤其是與女同志保持友好關係的女雙性戀更是常見採用此語彙來描述自己。Ault對此一現象採取批判態度，認為雙性戀者的此一身分宣稱方式，將造成雙性戀更不可見，而反觀臺灣脈絡，強調同志應包含雙性戀，並主張雙性戀就是同志的做法，對於雙性戀的發聲究竟是增加了可見度抑或使其不可見，或許需進一步探究，¹⁶但這並非此處論證的關鍵。這裡要指出的是，相對於前述學者所提出關於性認同的同一異一

¹⁶ 受訪者當中也有人表達對於雙性戀者不公開強調雙性戀認同的不滿。小華就強調：很多雙都隱身在同性戀群體中，他們「不敢去跟自己的伴侶講，或者不敢去沾惹類似的話題……只敢在受訪談的時候說：喔我是雙之類這樣，真的要參加運動的話，就可能還是會待在一個比較安全的區域（指同性戀群體）」（小華，2013/06）。

雙三元模式，在臺灣的同志一詞挪用歷史與運動論述脈絡下，同志對於雙性戀來說成爲性身分地景中的顯著重要選項。由於在臺灣的同志運動脈絡中，同志一詞被生產出同時具有「涵蓋LGBT的政治正確性論述」與「日常生活實作用語仍意指同性戀」這兩個層次意涵的落差，而正是此落差凹折出雙性戀認同者得以在互動場域中，既保全自身性認同、又可迴避凸顯差異身分的空間。但值得說明的是，雙性戀認同者對於同志一身分的採用，雖使得雙性戀與同性戀二者得以在性身分地景中，有了某種程度的統合，但此統合卻也反映出在不同性身分群體之間權力位置差異下，必須選擇維持住群體結盟關係，因而帶有那麼幾分不得不意味的自我敘說選擇。

（二）雙性戀與酷兒的實同名不同

相對於前一段指出，本研究中的許多受訪者除自我認同爲雙性戀外，也常採用同志此身分，然而，同樣具有納入不同非主流性身分的酷兒，卻鮮少被雙性戀者所採用。

酷兒與雙性戀認同之間的關連向來爲學者所關注，這是因爲雙性戀強調打破異／同邏輯，似乎吻合酷兒論述，但強調雙性情慾又似乎顯得固著於特定二元性別，因而顯得侷限。正如學者指出，雙性戀說法的限制，在於性別（gender）與性（sex）範疇並無法捕捉安居在該範疇下之真實生活主體的生命經驗，也無法理解該範疇中性別與性形成的動態過程（Ho 2003）。如果雙性戀的說法意味著逸出異同卻又框限了情慾流動，那麼自我認同爲雙性戀者，如何看待與回應此一說法，又爲什麼受訪者鮮少以酷兒身分標誌自身呢？

有趣的是，研究中的雙性戀雖然沒有任何一位採用了酷兒身分，但

如果進一步了解其對於自我性認同的詮釋，則我們又會發現，大多數受訪者都採取了相似於酷兒論述所強調的認同拼貼與非固定內涵。生理女的小雍就說：「我是雙性戀啊，但……要說我的認同可複雜了……而且我每次說都會不太一樣，現在的認同是……一個情感上面偏向於女生，身體慾望偏向於男生，但性幻想方面又是男生與男生，也就是俗稱的BL的幻想，然後尤其是BDSM的主題會更加吸引我……的一個雙性戀」。當被問到酷兒身分時，小雍的立即反應是「用酷兒去稱自己，會有點像是你被丟到酷兒大海……因為酷兒真的是很廣的一個名詞，包山包海……」（小雍，2013/01）。不過，語畢，小雍又隨即自我調侃自己的雙性戀定義，也是包山包海，所以下結論道，自己的認同在精神上其實是與酷兒相同的。

小雍對酷兒所抱持實同名不同的立場，同時也出現在多位受訪者身上，那麼為什麼仍選擇強調雙性戀認同呢？對於這個問題，受訪的回應呈現出既是為了運動，也是為了互動中自我揭露需求的兩個層次：

首先、受訪者最明顯的詮釋，乃呼應了雙性戀學者在討論雙性戀運動時所指出，即便認同乃拼貼、亦非本質，但就運動層次上來說，仍有必要透過採取認同政治方式，透過特定認同將人們集結的主張（Rust 1995）。在本研究中，對於關切雙性戀運動的受訪者來說（無論其是否參與雙性戀運動），即便自身抱持與酷兒論述對認同的同樣態度，但基於考量雙性戀運動需求，因此仍不願意強調酷兒身分，而偏好標舉雙性戀認同。在受訪者的言談中，這種運動的考量不僅表現在對於運動策略的評估上，也體現在運動中對連帶（solidarity）感的需求上。美文就主張：「我自己的想法是說，那酷兒就是雙性戀，不是嗎？……兩者是相互、怎麼說、就是相互包容，但我們在運動上現階段還是要從比較具體、容易講清楚的東西去講……因為現階段社會的性別意識，你講酷兒

的話，是沒辦法拉出新的空間出來，……因為你這樣等於是用了另一個世界的語言在跟別人講話，你至少要用一個人們聽得懂的語言啊。」

（美文，2013/03）吳昕更進一步從與同性戀的對照來清楚分析道引用酷兒身分對雙性戀的不利：「我一直覺得，就算雙性戀有很多……刻板印象，負面的東西，可是我還是覺得一定要用。……你用一個queer去講，我覺得會把雙性戀的聲音又模糊掉。……而且這樣的情形不會發生在同性戀群體身上。這樣對目前已經常不被看見的雙性戀者來說，更不利。」（吳昕，2013/01）

而從身處邊緣群體對連帶的需求感上來看，小雍生動描述第一次參加以雙性戀者為號召之聚會的興奮感受，令人印象深刻。他說儘管知道大家各自的雙性戀認同有著不同的內涵，但自己仍然覺得：「看到一個活生生會走、會跳的雙性戀，好高興！」，而且在那之後，當為了雙性戀發聲，而與其他團體發生爭執時，也覺得「有千千萬萬的雙性戀在背後支持著我，所以不會怕」（小雍，2013/01）。這些運動中基於認同所進行的爭取群體可見度以及連帶歸屬感，似乎都說明了學者所主張，後現代個人展演取徑式的解放，並無法提供政治運作的替代選項（Hemmings 1995）。

其次，除了考量運動需求外，受訪者也認為，雙性戀認同提供了互動中的需求。作為生理女的天行在訪談中屢屢表露對現行性／別體制的批判，尤其是女性性別角色所產生的限制，同時也認為喜歡不同性別的人，意味著自身情慾能力的拓展，是一件相當正面的事情。但一直勇於突破既定性／別框架的他，卻覺得還是需要某個可以溝通的名字，而對天行來說，雙性戀認同正具有向別人說自己的功能。他說：「我會去找一個我可以跟別人溝通的名字，但是我不喜歡被框說我是一個女生，或者是我只能怎樣，而對我來說雙性戀算是一個相對大的框架，也比較

符合我自己的樣子。」（天行，2013/01）這種將認同不只視為一種對自身的敘說建構，也同時是對外互動的重要媒介，在阿島的描述裡更加明確：「會說自己是雙性戀是因為……我覺得面對別人的時候，你必須讓別人看見你，我自己不需要去講這些名字我就可以看見自己，但是你面對別人的時候，必須讓別人用一個適合的名稱，讓別人知道你是誰」（阿島，2012/08）。

從性少數的理論的發展脈絡來看，長久以來，各種性少數身分一直遭異性戀正常化體制定義為所謂變態情慾位置而受檢視與導正。但 Foucault（1979）對於性實踐與性主體論述的研究，則指出這種對性少數的指認與定位，是19世紀以來各項性科學知識對於不同情慾實踐與性主體進行規制的權力運作產物，Foucault的說法無異戳破了異性戀體制強調異性情慾之自然性與本質性的虛妄，也因此提供了性少數對抗異性戀體制的重要理論基礎。而承續此論述權力與性實踐關連性的論點，酷兒理論則進一步由Foucault（1979）所指出論述雖是權力運作之效應，但也可能是阻礙與對抗之起點的主張出發，強調這意味著情慾實踐也可以提供一種翻轉的場域，亦即透過操演各種不同的性樣貌，將得以顛覆任何穩定不變的性身分內涵，進而解消既有以異性戀為獨大的性身分階層。

然而，酷兒理論此一翻轉、解消異性戀體制的主張，在臺灣特定的社會運動脈絡下，對於也承受著異性戀體制壓迫的雙性戀者來說，卻有著不一樣的解讀與回應。¹⁷ 對於本研究中的雙性戀者來說，或許因為自

¹⁷ 其實不僅是雙性戀對於同樣致力挑戰異性戀規範體制的酷兒論述，有著臺灣社會脈絡下的特定回應，同性戀對酷兒理論的回應，也同樣有其臺灣脈絡性。相對於英語世界中同志運動採用酷兒論述，導致其運動中形成兩種聲音：一派是強調公民權利，主張反異性戀霸權壓迫，同志應獲得各項平等權利；另一派則是訴求文化挑

身亦為性少數的緣故，幾乎對於性身分地景中的酷兒身分都不陌生，從受訪者的詮釋裡，我們也發現酷兒在臺灣被文化生產為一充滿變動、沒有特定樣貌的性身分。¹⁸ 不過，儘管受訪者清楚意識到自身雙性戀認同與酷兒論述的接合之處，但在雙性戀的整體發聲仍有限，以及考量在認同符指流動中，仍需要一特定、且即便為有限的特定意象，來建立與他人之連帶，以及實現與他人互動中可被某種程度理解的需求。在目前雙性戀身處於「比酷兒更可以被理解、但比同性戀更不被看見」的社會處境脈絡下，即便雙性戀認同與酷兒有內涵上的實質接和，但對雙認同者來說，酷兒仍反而成了性身分地景中，較不可欲之選項。此雙性戀者不偏好酷兒身分的現象，與英美世界對照，也突顯出情慾政治脈絡因素對於性身分選擇的影響：亦即，前述英語文獻指出，雙性戀運動往往批判酷兒政治的論述遮蔽了雙性戀認同（du Plessis 1996; Kaplan 1995），但在臺灣酷兒政治脈絡下，研究中的雙性戀者則是因為酷兒不易為一般人理解，因此恐將導致雙性戀更不可見，而鮮少採取酷兒身分。

戰，嘗試以解構各種性身分的定義與內涵，以回應異性戀規範（Gamson 1995），我國的同性戀運動，到目前為止則是雖有酷兒論述，但卻相對較少看到強調性身分多元的酷兒運動策略，這也正是為什麼趙彥寧（2000）會評論道：對照歐美酷兒運動以非文化菁英作為始作俑者，臺灣同志運動與論述雖不斷運用酷兒，但荒謬的是參與的運動者中卻完全不見非文化菁英、下層階級或扮裝人群（p. 389）。但受限篇幅與作者能力，本文此處僅處理雙性戀對於酷兒的回應。

¹⁸ 文中雙性戀者將酷兒身分理解為變動且多樣，但卻也不為多數人所熟悉的性身分，受訪者天行在談到酷兒時的第一個反應是：「我沒有那麼後現代，我很懶得在打扮上花心思。」（天行，2013/01）在這樣的敘說裡，酷兒的內涵不僅是一種情慾身分，也具有變動的身體意象。研究中受訪者對於酷兒身分的詮釋，可說呼應了卡維波（1998）分析臺灣酷兒運動時所指出，酷兒是一種由邊緣發聲、挑戰主流性階層體制的抗爭姿態，因此涵蓋各種多元情慾的說法。

五、反思性別與性的關連性：從雙認同實踐出發

如前所述，雙性情慾常被視為既吻合酷兒論述所強調對於既有情慾範疇的挑戰，又存在著未能捕捉情慾流動全貌的限制，而在討論雙性情慾實踐的顛覆與有限時，其關鍵核心議題，莫過於雙性戀情慾與性別之間的關連性。

關於雙性戀一詞與性別之間的關連性，學者向來有著不同看法：部分學者強調雙性戀應超越異／同結構，以避免再製既有範疇（Kaplan 1995），抑或主張要發展出雙性戀認同，就必須有開放的性別基模，亦即切斷性別與性偏好的關連性（Weinberg et al. 1994），甚至提倡基進雙性戀者應擁抱性別之流動，以真正解決性／別壓迫（Nagle 1995）。

前述理論皆訴求掙脫性別體制做為雙性情慾的核心特質，但在這種超越性別的呼籲下，也隨即有學者提醒，討論雙性情慾時，若忽略了性別因素對於關係中性別所造成的社會影響與個人影響，而直接宣稱超越性別，那麼這樣的訴求也可能造成誤導（Michel 1996）。這顯示，無論是強調開放性別基模，或是擁抱性別流動，這些論述都不應被立刻等同於我們可跳過對於性別體制的討論。也因此學者才會主張，探究雙性情慾中關於性別（gender）與情慾（sexuality）二者之間關連性，所可能帶來重要的啟發與洞見，可修正酷兒理論因強調性別展演與顛覆，而忽視探討性別體制在情慾實踐中所產生之作用的不足，因此成為雙性情慾研究最可能做出貢獻之處（Angelides 2001）。

本研究中的雙認同者，對於自身的情慾詮釋包括了「戀慾兩個性別」以及「無關性別」這兩種不同的呈現方式。不過，無論是哪一種定義方式，在其情慾實踐敘說中，都看得到性別體制如何交織穿透個人的情慾實踐，只是其著力之處不必然在決定情慾對象之性別上：

（一）作性別中產生的情慾限制

對於性別體制與雙性情慾實踐產生的關連，首先最爲明顯的莫過於日常生活作性別之模式所產生的影響。數位受訪者表示，雖曾多次受不同性別所吸引，但在情慾經驗發展上卻常偏向同一性別，而主要原因之一即受自身作性別與性別互動所影響。生理男青文就表示自己總是矛盾地、不由自主地將所謂的男性責任扛在身上：「我對於男女互動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當我跟一個女生或我欣賞的女生相處時，我……會不自覺地就覺得我應該要保護她或多照顧她……我知道那個潛意識其實是我在弱化她這個角色，這是不應該的，可是，我還是會有這種卡住的狀態……但我發現跟男生相處就反而比較輕鬆，以拿包包來說，如果包包真的看起來很重，我會問他要不要幫忙，如果他自己OK，那我也會覺得那他自己來就好了……。」（青文，2013/01）而同樣是生理男的中慈雖然有意識地排除此期待，但仍覺得女生不可避免會將承擔的責任放到自己身上，因而感到卻步：「……感覺很少會遇到可以交往的女的……因爲我覺得女生在跟男生交往的時候，常常會把一些責任放在男生身上，那是我不想要的……。」（中慈，2013/03）這種情形也同樣發生在生理女身上，小達十分強調雙性戀的愛是不分性別的，但同時也自陳相較而言，愛慕男性的經驗明顯少於對女性，因爲他覺得絕大多數男人總是被教養爲攻擊性太強，令人感到須抱持戒心而無法放鬆「我就覺得……男人就是一個很慾望的動物吧！是一個好像……永遠都不能滿足，總是會把女人當作一種滿足自我的虛榮心工具」（小達，2012/11）。

受訪者的經驗顯示，即便在情慾對象上能跳脫同／異架構的限制，抑或是情慾對象能超越以性別做爲依據，但可欲（desirable）的情慾對

象，要在情慾實踐中轉化為個人偏好（preferable）的情慾對象時，中間仍架立著作性別與性別互動模式下產生的濾網。

（二）性別透過身體印記產生的情慾限制

性別體制對於情慾的影響，也同時體現在身體互動時所依循的性別模式，這種性別體制賦予身體的意義，在對比與男性和女性的互動上，便顯得清楚可見。對於情慾實踐的性別化，女性主義已提出許多相關研究，正如Beasley（2005）所指出，女性主義致力於點出情慾實踐乃鑲嵌於特定權力架構中，而性別體制便是當中的核心權力主軸。如Lord（1984）便批判女性必須馴服與溫順的性別規範，深刻地影響了女性的性腳本，使其鮮少能面對並探索自身情慾，而Connell（1995）則強調此性別體制也同樣作用於男性情慾實踐上。不過，晚近研究則點出，關注性別化情慾實踐中的權力作用時，也應同時分析行動者在特定社會脈絡下對此體制進行的逾越與挑戰（Gagné and Tewksbury 2002）。而這種既鑲嵌也逾越性別體制的情慾實踐現象，在本研究之雙性戀者情慾實踐中便可見端倪。

與男性和女性都有交往經驗的生理女小雍，就談到自己在發展女友情慾探索上，總容易陷入長期曖昧，其中所常遭遇的主要挫折之一，就來自於身體互動上性別界線的模糊。「如果對方是異性的話，你從小到大成長的環境就讓你知曉，你跟異性之間不太可能發展成這樣（指身體上的碰觸範圍），如果碰成那樣，你還要說你跟對方是好朋友關係，人家一定會說：我聽你在亂講！所以那個界線會更清楚。但同性就不是……女生會比較習慣就是說比如手拉手去哪啦，或者是抱抱……所以當我感覺我的身體感知開始不一樣了，開始會有enjoy的感覺……但卻

發現對方並不是這種心思，你會突然了解原來彼此在身體互動這一點上並不同步……所以從跟男生交往轉換為跟女生交往的過程，就是會包括了整個身體界線的重整……那個過程，很累」（小雍，2013/03）。

在小雍的經驗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女男的探索交往中，彼此對身體界線所賦予的意涵往往有著潛在、卻清楚的社會腳本可依循，雙方也因此較為容易達成身體情慾互動上的相互理解。但在女女互動時，卻無法找出身體知覺的共同意義詮釋基礎，因此，必須重建互動中的身體界線，也必須找出彼此能接受的模式。這顯示既有情慾上的身體互動模式，乃是由性別規範（女性應仔細監控自身身體與生理男性的接觸範圍）連結上異性戀情慾的基礎與想像所建立。而在此預設基準模式之外的身體情慾互動，因為缺乏現象學所謂的理所當然之意義基礎，也因此產生了適應調整的成本。

另一位受訪者生理男小米早年曾與一位FTM跨性別者交往過，在初步交往的過程裡，小米很自然地接受了對方的男性認同，也接受對方跨的身分，但小米回憶起與對方進行性行為初期，看到對方未經手術的原生性別身體時，自己當下卻產生不知如何對待對方第一、二性徵之性器官的猶豫與遲疑：依據小米的說法，此反應上的遲疑來自於兩個層面：一方面是無法明確衡量對方性別認同對其性實踐的影響，小米解釋道「女生的身體對我是有吸引力的，對，而且在那個性的過程裡面，我會覺得，做愛的方式是很多種的，就不見得是像一般男女那種，男插入女的這種方式，老實說玩法可以有很多，可是因為他是跨的身分，所以一開始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排斥的時候……你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很厭惡你碰他的那個女性生殖器……那個界線不好拿捏」；另一方面，小米並非沒有與生理女有過情慾關係，只是在他的經驗詮釋上，與那特定女性樣貌身體的互動中，牽繫著的是一種與女性的情慾感知，所以小米說：

「看到那個身體，提醒我的是……我知道我對女性的身體是有慾望，它會連結我對女性的某一種情慾」，但這樣的感受，又與自己一直將對方視為男性的認知，形成某種程度的衝突，因此導致在性互動的初期階段裡，產生不知該如何與對方進行身體互動的停滯，小米形容那是一種「恍神」的狀態：「我有時候也可能在那個情境下……呃……出神，就是我可能會在那邊恍神，然後想到說，呃，這果然是一個很女性的身體，就是已經跳脫了那個情境的感覺，然後在那邊，啊這果然是一個女性的身體」（小米，2013/07）。這再一次顯示出情慾互動中，性別與情慾之間的關連性，並非僅表現在既有理論所討論的情慾對象選擇之性別，即便不在乎對象的性別，但性別仍可能透過賦予身體意義，而與情慾實踐產生連結。正如前述Esterberg（1997）研究所指出，雙性戀此性身分相對來說是低體制化的，亦即關於「作為雙性戀」並沒有一定的說法，也無規則可依循。而或許正因為在缺乏雙性情慾腳本的情況下，所以儘管雙性戀者嘗試突破既有的性別與情慾之連結模式，但性別二元體制的性腳本仍透過身體界線與身體印記滲入其情慾互動中。

前述性別體制框架情慾實踐的討論，說明了無論是異／同之外或是酷兒的流動，都並不理所當然等同於跳脫性別體制框架，而這也挑戰了前述Weinberg等人（1994）所主張，必須抱持開放性別基模才得以實現雙性情慾的論述。

然而，這也並非意指受訪者的雙性情慾實踐乃全然受限於性別架構。在受訪者的情慾實踐中，也存在著有意識地挑戰二元性別體制之性別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對二元性別認同之挑戰，並不必然如一般詮釋雙性戀認同內涵所主張，訴諸在情慾互動上將對方視為一個人，因此強調情慾乃無關乎性別。反而是從既有性別範疇基礎出發，但強調性別的非固著特質。如宣稱自己是雙性戀中、少見對男生與女生二者情慾

偏好皆十分等量的生理女左巴，在討論自己的性別與情慾實踐時，便很清楚地表達他對於性別二分框架的拒絕，這不僅體現在他自己的性別展演模式，「我對於我自己的造型也希望是很多變的，就是長頭髮、短頭髮，或者說……男性裝扮，女性裝扮都可以輪流出現這樣子」，同時也包含對於關係對象的要求。他談到他曾經在與交往對象聊天談話中，才赫然發現已經交往一段時間的女朋友的自我認同為T，於是忍不住一直說服對方不需要堅持一定的性別角色，不斷地跟對方說「你一定要覺得自己是T嗎？」（左巴，2012/03）。

在左巴的情慾詮釋裡，幾乎從未提及中性，或是不在乎性別的說法。他很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男性和女性這兩個概念範疇，但同時也主張在不同時間點、不同場域中，個人得以轉換不同性別展演是一種解放自由的狀態。而左巴的性別認同解放，也同樣表現在情慾實踐的開放性上。除了在訪談中強調「我可以跟同性戀談同性感情的事情，也可以跟異性戀聊異性戀感情，所以我覺得我什麼都可以談，也覺得自己好棒」。因此，十分以自己是雙性戀為榮外，左巴甚至也偶爾嘗試向周遭的男同性戀或異性戀女生半真半假地示好，希望能夠讓男同感受到女男情慾，也希望讓異女體驗女女之戀。他自己詮釋這樣的舉動是因為「我覺得我應該是在試探吧。就是試探……個人的性認同有沒有可能被輕易扭轉還是怎麼樣」（左巴，2012/03）。我們可以發現，左巴隱然抱持著一旦性別處於流動，那麼異同情慾之分也就可能被移轉的解放既有情慾體系之主張，然而，左巴並未捨棄以女、男性別範疇來定義與建立情慾關係。

前述性別與情慾之間如何連結的不同經驗顯示，儘管雙性戀論者常傾向主張超越性別的雙性情慾，似乎比堅持以兩個性別來定義情慾來得更為基進且自由。但受訪者的經驗卻顯示，無論其雙性戀認同內涵強調

的是愛一個人還是兩種性別，社會的性別框架仍會使得特定性別在互動中較為令人偏好，且性別的身體規範也使得性少數有必要在互動中重新創造身體舉措的意義基礎。而即便強調以男性和女性來標示自身情慾對象，也並不等於全然受限於性別體制，而是可能透過二元性別的交錯呈現，挑戰固著的性別範疇，進而鬆動異／同之分。這說明在性別與情慾實踐之關連性的討論上，何謂流動、又何謂受限，都需要回到情慾互動的意義詮釋中，說明什麼樣的結構如何產生作用，又在什麼樣的展演方式下被挑戰。¹⁹

六、小結

從Foucault的論述來看，任何情慾身分的命名都是特定社會論述脈絡下的建構產物，由此對情慾身分的探究取徑出發，本文希望將雙性戀者的自我命名與情慾實踐扣回臺灣的性少數運動與性少數文化脈絡。回顧雙性戀此一性身分受關注的歷史來看，自從雙性戀在性少數運動中發聲以來，雙性戀理論的討論很快便注意到雙的特殊處境，Pramaggiore等學者所提出的藩籬知識論，指出雙性戀總是被劃歸為特定情慾之外，因此成為騎牆者，而Hemmings則依循此藩籬知識論，進一步指出雙性情慾總是處在中界之處，因為雙性情慾僅被用以強調異／同邏輯甚至酷兒

¹⁹ 常與男、女同性戀圈以及雙性戀圈互動的受訪者美文表示，雙性戀社群裡成員的互動，既讓男女共同相處，但又並非遵循既有的男女情慾模式，「……裡面的男生，基本上都不會堅持一定要扮演主導角色，也沒有真的誰比較強或弱的那個狀況，就是蠻平等的」，在這樣的觀察下，美文宣稱「我一直都覺得雙性戀認同是可以促成男女平等，先不講其他多元認同，光就男女平等來說，我覺得其實幫助是很大的，也是雙性戀的重要價值。」（美文，2013/03）美文的宣稱亦突顯出雙認同與性別體制的關連，值得進一步探究。

論述的不足與有限，因此成爲一抽象性的存在。而進一步探究關於雙性戀與雙性情慾的經驗性研究，我們又發現當研究者嘗試賦予雙性戀具體樣貌時，往往傾向以既有的異同範疇來建構雙性戀，使得我們對雙性戀如何詮釋自身情慾所知仍相當有限。雙性戀的此一中界處境正是本研究的起點。但本文同時也強調，Pramaggiore與Hemmings所啓發我們看到的雙性情慾之中界處境，不應被視爲一普遍性的同質概念，而是有必要進一步予以脈絡化的詮釋與探究，因爲在不同的脈絡下，將會有依循不同論述劃界方式所產生的中界境況。亦即，雙性戀者總是必須在回應異／同邏輯或其他性身分論述中，以建構認同與實踐雙性情慾，但不同社會脈絡，卻有著不同的性少數情慾相關論述，排擠或開啓出雙性戀情慾委身於其中的中界處境，而雙性戀者如何詮釋與回應此處境，也同樣深受社會脈絡中可得的論述資源所影響。

透過研究參與者的敘說與詮釋，本研究發現，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下，自我認同爲雙性戀者所面對的中界處境與其回應方式，乃深受臺灣的性少數運動發展、各性身分在臺灣被生產出的文化意涵，以及現代性氛圍等社會脈絡因素所影響。亦即呼應學者指出，臺灣同性戀平權運動開創出了同志次文化與同志社群（王雅各 1999），這些同志次文化與同志社群，都成爲雙性戀者透過劃界以建立自我性身分的重要參照。

另一方面，在建立雙性戀自我認同後，如何進一步賦予雙性戀意涵上，研究中多位受訪者所參與的雙性戀社群，轉爲選擇以非關性身分的自我追尋論述作爲雙性戀內涵（只要個人說自己是雙性戀，那他就是）。儘管這樣的認同論述，似難以作爲社會運動動員的集體認同基礎，但值得注意的是，從關注社會脈絡與自我認同之關連性議題來看，這樣的論述走向，反映出Giddens等學者所提出現代性氛圍的影響，亦即顯示在大論述瓦解的現代社會中，個體透過反思以追求自我實現的動

力，在個人性認同建構歷程中開始扮演重要因素。

而在探究雙性戀的性自我建構與雙性情慾實踐過程中，我們也進一步發現，雙性戀者的生命經驗提供我們重新書寫性別（gender）與情慾（sexuality）關連性的可能樣貌。這主要包含了兩個面向：

首先，在劃分性身分地景上，異／同邏輯將性身分性別化，酷兒理論則強調超越性別。而本研究中的雙性戀者雖然嘗試跳脫異／同邏輯，但卻也拒絕了強調超越性別的「酷兒」身分，而選擇了以去性別方式採用臺灣性少數運動中常被使用的「同志」身分（生理男的雙性戀者會說自己是同志，但不是男同志）。這說明在情慾身分建構上，即便強調跳脫性別以超越異同邏輯，但我們仍有必要進一步以社會脈絡中的論述／權力關係，來解釋所謂跳脫性別的性身分選擇。

其次、在情慾實踐上，儘管無論是雙性戀者的生命敘說經驗，或是雙性情慾研究，都強調以性別劃分為基礎的異／同邏輯無法適切地解釋雙性情慾（Eadie 1993; Kaplan 1995; Firestein 1996），但本研究仍發現，一方面雙性戀者雖宣稱情慾對象上兩種性別皆可接受，或無關性別，但在其實際情慾選擇上，二元性別體制的性別角色規範，仍使雙性戀者因著性別而有特定偏好；另一方面，體現二元性別的情慾腳本與身體意義，也使得所謂跨越性別的雙性情慾實踐過程中，仍依循著性別化的身體互動模式。這顯示既有的二元性別體制，仍以某種程度框架了雙性戀主體的情慾實踐。

如果本文的前述討論，可某種程度地被接受，那麼這篇文章便在此留下四個可後續探究的議題：首先、本文前述討論所指出，臺灣的同性戀運動與相關論述貫穿著雙性戀認同的建構，也影響著雙性戀者在性身分地景上的位置與選擇。那麼，未來性少數運動的發展情形，將如何影響雙性戀認同與雙性情慾的實踐便值得持續觀察。其次、無論是強調雙

性戀身分建構受臺灣性少數運動影響，或是延續文中所指出多位雙性戀者強調的追求自我實現與自我打造風格來看，雙性戀認同之建構也就因此不應被視為一種完成特定階段的封閉狀態。因為個人的情慾經驗、社會中性少數社群的文化樣貌，或是性身分地景的改變等，都可能持續影響此性認同的後續維持與實踐。尤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由此重視性身分自我打造風格出發，將如何可能進一步實踐Jamieson所提出現代社會特有，重視交談傾聽、分享、表露情感，以維持深切認識與了解的揭露式親密關係（Jamieson 2002），因而得以實現一種更具平等性、相互深知的純粹關係，值得進一步探究。再者、雙性情慾實踐中體現出性別與情慾連結的多樣性，並非僅以分析情慾對象是否固著於特定性別得以回答，那麼，我們或許有必要進一步探究所謂情慾流動的多元樣貌中可能交織的結構翻轉與壓迫，避免落入流動與不流動的簡化論述。最後、本研究之參與者具有相當程度的同質性，不僅多數為女性，更重要的是多生活於都會區、相對年輕、具大學以上教育程度，且大多有接觸、參與性別運動組織的經驗，因此，明顯可看出具高文化資本之特質，而此特質可能導致研究中雙性戀者之所以呈現透過性少數社群探究自我認同、引用自我實現論述來詮釋自身情慾流動，以及運用同志運動語彙來詮釋自身雙性情慾等認同建構現象。此不僅形成本研究之限制，也由此突顯出，本研究所未納入之缺乏社群支持，以及缺乏同志運動與情慾流動等論述資源之雙性戀者的性自我建構經驗，將是未來可持續探究之議題。

作者簡介

陳素秋，作者現任職於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研究領域主要為性別政治、公民身分研究以及文化社會學。

參考書目

- 王雅各，1999，《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台北：開心陽光。
- 卡維波，1998，〈什麼是酷兒〉。《性／別研究：酷兒理論與政治》3-4: 32-46。
- 何春蕤，2010，《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新局》。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徐佐銘，1999，〈雙性戀的定義〉。論文發表於「第四屆『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5月1日至2日。
- 陳洛葳，2011，《我愛她也愛他：18位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台北：心靈工坊。
- 甯應斌，2007，〈同性戀是社會建構嗎？——保守與革命的社會建構論〉。《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 1-55。
- 曾漢津、游美惠，2008，〈試論台灣雙性戀者的身分認同、社會處境與情慾實踐〉。《研究台灣》5: 75-106。
- 認識同志手冊編輯小組，2003，《台北2003同志公民運動：認識同志手冊》。台北：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 趙彥寧，2000，〈臺灣同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個關於文化生產的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0: 207-244。
- Angelides, Steven, 2001, *A History of Bi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ult, Amber, 1996, "Ambiguous Identity in an Unambiguous Sex/Gender Structure: The Case of Bisexual Wome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3): 449-463.

- Beasley, Chris, 2005, *Gender and Sexuality: Critical Theories, Critical Thinker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Blumstein, Philip W. and Pepper Schwartz, 1977, "Bisexuality: Some Social Psychological Issu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3(2): 30-45.
- Bradford, Mary, 2004, "The Bisexual Experience: Living in A Dichotomous Culture." *Journal of Bisexuality* 4(1-2): 7-23.
- Callis, April S., 2009, "Playing with Butler and Foucault- Bisexuality and Queer Theory." *Journal of Bisexuality* 9(3-4): 213-233.
- Connell, Raewyn, 1995, *Masculini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ydney, Allen & Unwi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u Plessis, Marina, 1996, "Blatantly Bisexual; or, Unthinking Queer Theory." Pp. 19-43 in *RePresenting Bisexualities: Subjects and Cultures of Fluid Desire*, edited by Donald Hall and Maria Pramaggio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Eadie, Jo, 1993, "Activating Bisexuality: Towards A Bi/Sexual politics." Pp. 139-170 in *Activating Theory: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olitics*, edited by Joseph Bristow and Andlia Wilso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Esterberg, Kristin G., 1997, *Lesbian and Bisexual Identiti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79,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Lane.
- Firestein, Beth A., 1996, *Bisexuality: Th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an Invisible Minority*.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Garber, Marjorie B., 1995, *Vice Versa: Bisexuality and the Eroticism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gné, Patricia and Richard Tewksbury, 2002, "Introduction: Advancing Gender Research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Pp. 1-12 in *Gendered Sexualities*. edited by Patricia Gagné and Richard Tewksbury. New York: JAI.
- Gamson, Joshua, 1995, "Must Identity Movements Self-Destruct? A Queer Dilemma." *Social Problems* 42(3): 390-407.
- Hemmings, Clare, 1995, "Locating Isexual Identities: Discourses of Bisexuality and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Pp. 37-49 in *Mapping Desire: Geographies of Sexualities*, edited by David Bell and Gill Valentine. London: Routledge.
- , 2002, *Bisexual spaces: A Geography of Sexuality and Gender*. London: Routledge.
- Ho, Josephine, 2003, "Trans-Sexuality: Bisexual Forma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ategor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Super-Slim Conference on Politics of Gender/Sexuality, Zhongli, Taiwan, December 14.
- Israel, Tania and Jonathan J. Mohr, 2004, "Attitudes Toward Bisexual Women and Men: Current Research,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Bisexuality* 4: 117-134.
- Jamieson, Lynn 著、蔡明璋譯，2002，〈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台北：群學。（Jamieson, Lynn, 1998, *Intimac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aplan, Rebecca, 1995, "Directions Our Visionary Voices: Your Fence

- Is Sitting on Me: The Hazards of Binary Thinking.” Pp. 267-280 in *Bisexual Politics: Theories, Queries & Visions*, edited by Naomi Tucker.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Loftus, Brian, 1996, “Biopia: Bisexuality and the Crisis of Visibility in A Queer Symbolic.” Pp. 207-233 in *Representing Bisexualities: Subjects and Cultures of Fluid Desire*, edited by Donald E. Hall and Maria Pramaggio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Lord, Audre, 1984, “The uses of the erotic as power.” pp. 87-91 in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edited by Audre Lorde and Cheryl Clarke. Freedom, CA: Crossing Press.
- Michel, Frann, 1996, “Do Bats Eat Cats? Reading What Bisexuality Does.” Pp. 55-69 in *Representing Bisexualities: Subjects and Cultures of Fluid Desire*, edited by Donald E. Hall and Maria Pramaggio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Mulick, Patrick S., and Wright Lester W. Jr., 2002, “Examining the Existence of Biphobia in the Heterosexual and Homosexual Populations.” *Journal of Bisexuality* 2: 45-64.
- _____, 2011, “The Biphobia Scale A Decade Later: Reflections and Additions.” *Journal of Bisexuality* 11(4): 453-457.
- Nagle, Jill, 1995, “Directions Our Visionary Voices: Framing Radical Bisexuality: Toward A Gender Agenda.” Pp. 305-314 in *Bisexual Politics: Theories, Queries & Visions*, edited by Naomi Tucker.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Ochs, Robyn, 1996, “Biphobia: It Goes More Than Two Ways.” Pp. 217-239 in *Bisexuality: Th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An Invisible Minority*,

- edited by Beth A. Firestein.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Pennington, Suzanne, 2009, "Bisexuals 'Doing Gender'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Bisexuality* 9(1): 33-69.
- Pramaggiore, Maria, 1996, "Epistemologies of the Fence." Pp. 8-19 in *RePresenting bisexualities: subjects and cultures of fluid desire*, edited by Donald E. Hall and Maria Pramaggio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Pratt, John D., 1982, "The Sexual Landscape - Repression or Freedo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1): 65-84.
- Rust, Paula C., 1995, *Bisexuality and the Challenge to Lesbian Politics: Sex, Loyalty,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 1996a, "Managing Multiple Identities: Diversity Among Bisexual Women and Men." Pp. 53-83 in *Bisexuality: Th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an invisible minority*, edited by Beth A. Firestein.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Publications.
- , 1996b, "Sexual Identity and Bisexual Identities: The Struggle for Self-Description in A Changing Sexual Landscape." Pp. 65-86 in *Queer Studies: A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ed Anthology*, edited by Brett Beemyn and Mickey Eliaso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 2000, *Bisex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90,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einman, Erich, 2001, "Interpreting the Invisibility of Male Bisexuality:

- Theories, Interactions, Politics.” *Journal of Bisexuality* 1(2/3): 15-45.
- , 2011, “Revisiting the Invisibility of (Male) Bisexuality: Grounding (Queer) Theory, Centering Bisexual Absences and Examining Masculinities.” *Journal of Bisexuality* 11(4): 399-411.
- Tucker, Naomi, 1995, *Bisexual Politics: Theories, Queries, and Vision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Udis-Kessler, Amanda, 1995, “Identity/Politics: A History of the Bisexual Movement.” Pp. 17-30 in *Bisexual Politics: Theories, Queries & Visions*, edited by Naomi. Tucker. New York: Haworth Press.
- Weinberg, Martin S., Colin J. Williams and Douglas W. Pryor, 1994, *Dual Attraction: Understanding Bisexuality*.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